

Z HISHI XINYANG XIANDAIHUA

HONGGUO ZHENGZHI SHEHUIHUA ZHONG DE GAODENG JIAOYU

知识 信仰 现代化

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

董雅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Z HISHI XINYANG XIANDAIHUA

HONGGUO ZHENGZHI SHEHUIHUA ZHONG DE GAODENG JIAOYU

知识 信仰 现代化

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

董雅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信仰·现代化: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
董雅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309-04906-3

I. 知… II. 董…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733 号

知识·信仰·现代化: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
董雅华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丽琴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906-3/D · 301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udan University**

(1905-2005)

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引言：

知识、信仰与大学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中世纪欧洲对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创建了大学。大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知识与信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培养了人文主义精神，而且为近代欧洲现代化发展孕育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①。大学因11、12世纪欧洲的城市革命而产生，城市因大学的发展而走向现代化^②。大学与人类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历史铸就的。在这种关系中，大学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现代大学虽然是从中世纪盛期的大学直接发展而来的，但是，现代大学与中世纪的大学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核心的体现为两点：一是知识不再作为垄断性资源来分配，而是作为大众公共性资源来分配；二是信仰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天国走向人间，大学日益成为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空间。大学在近现代发展中产生的这两点变化，是现代化发展推动的结果，同时，基于这两大变化而形成的现代大学，对于人类的现代化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现代大学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为直接、更为全面。

① [法] 雅克·勒戈夫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

② [美] C·沃伦·霍莱斯特著：《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9页。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交的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研究报告,报告在思考21世纪教育与学习中,全面强调和肯定了现代大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一个社会中,高等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又是终生教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既是知识的保管者,又是知识的创造者。此外,它还是传播人类积累的文化和科学经验的主要工具。在智力资源作为发展因素与物质资源相比将越来越占优势的未來社会,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只会日趋增加。另外,由于革新和技术进步,经济领域将越来越需要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人才。”^①可以说,在今天任何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大学,大学已成为一个社会不竭的生命源泉。

然而,在大学与社会关系上一直暗含着这样一种冲突:大学越发展,就越寻求摆脱国家权力的干预;而与此同时,现代社会越发展,就越需要大学的贡献和服务。作为大学发展内在动力的创新精神对自由和自主的渴望,是这种冲突的最直接原因,而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财政依赖使得这种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这种冲突内含的价值是十分深刻的,因为,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大学的自由与大学的社会责任之间能否在大学的活动和实践中获得内在的统一?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②,也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大学的

① 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② 关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不同意见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唯心主义认为,教育是为它本身而独立存在的。唯意志论深信,教育不受社会结构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的影响,能够而且必须改变世界。机械决定论主张,教育的形式和前途直接为周围环境中与之同时发生的各种因素所控制。最后,从这三个学派衍生出来的学说假定,教育必然重演,甚至加深和延续社会上遗留下来的坏事,而这些坏事目前正在受到这个学派的拥护者极其尖锐的批评。他们主张:不彻底改变社会,就不可能解救教育。不过显然和这个主张矛盾的是,他们又认为,教育世界可用它本身内部的革命为以后的社会革命铺平道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发展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力和自由空间。大学也因此获得更大的创新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其本质,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大学所具有的二重属性:大学的自由是大学的知识属性所决定的;而大学的社会责任则是大学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任何大学的发展都不可能把这两个属性割裂开来。作为知识属性的大学,大学的自由发展,一方面是在知识领域中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在一定社会空间中的自由;作为社会属性的大学,大学的社会责任,就是要用知识、智慧和知识所体现出的人类德性来培养健全的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人民的幸福。而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这种培养,不是大学的空间所能完成的,它还需要社会空间。因而,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取向,不可能是抽象的,一定是大学的价值追求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互动的结果。正因为这样,在现代政治架构下,大学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环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在政治社会化中,学校系统显然是最系统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之一。在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都可以看到受过教育的人能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政治更为关心,对政治领导人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并表现出更强的政治能力。”^①

由此可见,大学的自由与大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大学的自由,只有在大学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而大学只有使知识真正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才能真正履行服务社会的责任。这种辩证统一,决定了现代大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传播知识和开发知识;二是培育德性和选择价值。这双重职能是有机统一的,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成为一种没有灵性的教条和说教;没有后者,知识对于人来说,就不是人生成长的资源,而仅仅是一种工具,这正如美国基础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教育委员会在他们发表的委员会纲领中指出的那样：学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供道德判断的环境，如果缺乏这种环境，教育则仅仅是一种动物式的训练。用教育家坎德尔（Kandel, I. L.）的话说：学校是‘使孩子在人类知识的基础领域中成为有学识的人’的场所。”^①

大学的职能决定大学的教育。大学的基础教育应该围绕着这些方面来展开。曾任日本文部大臣的日本教育学家永井道雄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出版的《日本的大学——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大学是探索真理、培养专家的机关，也可以说是陶冶人格的基础教育场所。”“基础教育一方面包括科学地认识事物，另一方面还要追求一切美的、善的、神圣的价值，从而创造美、欣赏美、有信仰而与人为善。观念是重要的，但是观念并不等于一切。要培养和造就包括态度以及习惯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创造性、有信仰，并且能付诸行动的人，才是基础教育所追求的崇高理想。”^②大学的职能所决定的大学教育结构和价值取向是为社会培养健全而全面发展的人，而这对政治社会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这种教育提供了优秀公民的最基本的要素。换言之，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大学的教育，不论是知识教育，还是德性教育和价值选择，都具有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和意义。偏废任何一方，都将直接影响到政治社会化的取向和后果，从而影响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往往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大学对整个社会发展所负的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突出。”^③

① 翟葆奎主编：《美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7 页。

② 〔日〕永井道雄著：《日本的大学——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4 页。

③ 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4 页。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大学知识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传授科学的精神、健康的思维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对于受教育者的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智力和能力的基础；而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这是社会发展创新力量的基本源泉。然而，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就能完成的，它应该是一个以知识为媒介的人际间精神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都对知识教育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角度讲，知识教育的过程，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传递的过程，还应该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否则，这种知识教育不但不会开启心智，反而扭曲、甚至压抑心智。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的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报告中告诫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注意知识教育中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心理关怀，使知识传递的过程成为全面开发人的智力、能力、情感和德性，从而真正拥有创造性的过程。报告这样写道：“人是在创造活动中并通过创造活动来完善他自己的。他的创造机能就是那种对文化最敏感的机能，就是那种最能丰富和超越成就的机能，也就是那种最容易受到压制与挫折的机能。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在这个范围内有它复杂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保持一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而不放弃把他放在真实生活中的需要；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不助长他的个人主义；密切注意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而不忽视创造也是一种集体活动。认清这些任务乃是现代心理教育学研究最有成果的智力成就之一。”^①

正如大学的知识教育不能忽视对知识之外的德性、情感和行为的关怀一样，大学的德性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德育，不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88 页。



能被抽象地视为一种道德的说教或信仰的灌输,而应该有知识和实践的支撑。这不是德育的方式与技巧问题,而是学校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指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因此,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①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他在《我们的信条》中指出: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②。与知识教育相比,德育对于政治观念、价值选择和信仰铸造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入的影响。正因为德育与政治社会化关系的更为直接和深入,所以,德育的效果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实践证明,在大学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中,要形成合理有效的价值引导和精神、信仰的启迪,最有效的力量,是来自知识和社会实践的积累,因为人们对价值、信仰的选择,往往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认识社会,二是认识自我,而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最好方式就是具体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行动。为此,北欧国家瑞典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学校教育必须包括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197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题为《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座谈会上,瑞典方面提交的论文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大学的传统职能一般是产生新知识和对学生进行治疗。大学是独立性的,政治团体一般并不干预学校的科学和学术生活。学生不参加学校周围社区的社会政治事务。但是,在1977年的《高等教育法》中,规定高等院校应深入地参加发展活动,高等学校应和当地社区紧密联系起来^③。这个法律规定

① [美]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② 陶行知著:《中国教育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③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实际上明确了教育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明确了社会实践是学校德育、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途径。当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其具体标准和要求是有差异的，但从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最一般原理来看，除开具有的意识形态不谈，大学德育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过程，作为社会、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最需要培养的价值取向大致都有四个方面：即社会责任感、爱国心、公共观念与公民意识。显然，这些思想和精神都离不开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感悟和积累。

大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大学离不开社会，同样，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大学。大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培育人才，创造新知识，而这个基本使命要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动力，就必须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西方学者亨利·纽曼在《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一文中这样说道：“如果必须给大学课程制定一个实用的目的，那么我说它就是训练社会的良好成员。它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是适应世界。……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①

本篇论文正是基于对大学功能和目的的上述认识，来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

① [英]亨利·纽曼：《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见《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目 录

目

录

引言：知识、信仰与大学	1
第一章 问题、概念与理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与研究路径	2
一、问题来自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2
二、从“政治社会化”研究问题	6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及其运用	9
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	9
二、“政治社会化”概念在本文的运用	14
第三节 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	17
一、理论工具	17
二、分析方法	22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化	24
第一节 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与政治社会化	24
一、现代化及其价值向度	24
二、政治社会化在现代化中的意义	31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中的政治社会化	34
一、1840—1949 年：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化	35
二、1949—2000 年：现代化第二阶段的中国政治社会化	44



第三章 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	52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的体系及其中国模式	53
一、政治社会化体系的一般结构	53
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化模式	58
三、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模式	62
第二节 中国高等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	69
一、中国高等教育与现代化	69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76
 第四章 1978 至 1989 年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社会化	
取向	81
第一节 现代化中知识与信仰的失衡	82
一、现代化危机中知识与信仰的失衡	82
二、历史性转折与高等教育的使命	86
三、现代化发展中知识与信仰的再度失衡	89
第二节 信仰危机与薄弱的学校教育	92
一、教育理念	93
二、教育定位	97
三、教育组织	99
第三节 信仰危机与社会环境影响	106
一、西方思潮及其影响	106
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消极现象的影响	111
 第五章 1990 年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政治社会化取向	114
第一节 在历史的反思中整合知识与信仰	114
一、知识与信仰失衡的再认识	114
二、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的建立	121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信仰重塑	124



一、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125
二、以民主法制观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教育	133
第三节 道德教育与信仰内化	140
一、爱国主义：道德教育的切入口	141
二、集体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	147
三、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	151
第六章 高等教育中价值分配的体系与过程	157
第一节 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及其体系	157
一、“两课”互补：政治社会化教育的主渠道	158
二、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互动：政治社会化教育的 良性循环	161
三、党政合力与社会参与：政治社会化教育的系统工程	164
第二节 高校“两课”教育的过程分析	167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发展	168
二、教材建设的发展	178
三、教学方法的发展	181
四、队伍建设的发展	187
第三节 高校课外教育的过程分析	195
一、校园文化与政治意识培养	195
二、社会实践与政治素质培养	200
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责任	204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任务	205
一、全球化时代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205
二、培育“新政治人”：中国高等教育的责任	211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社会化教育	213
一、全球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213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教育	218



第三节 信息时代的政治社会化教育	229
一、信息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229
二、信息时代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教育	231

结论	240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4



第一章

问题、概念与理论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强烈的现代化冲动赋予了高等教育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全面确立,把中国现代化发展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现代化发展所经历的曲折与高等教育发展所经历的曲折共同展现出一副奇特的历史画卷:即高等教育的发展时刻与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处境密切相关。其中,现代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决定高等教育的取向;而高等教育取向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反过来影响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基础。正因为充分意识到高等教育发展与现代化发展实际处境之间的深刻相关性,所以,有必要首先从大学履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变化和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所经历的起伏和曲折,从中揭示中国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高等教育对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要培养有知识的人,而且要培养有道德、有信仰的人。知识与信仰的平衡,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资源。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与研究路径

一、问题来自中国现代化的逻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过程,它是此前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发展现代化。这两大任务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现代化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从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来看,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是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但是,对于新生的国家和新生的政权来说,要巩固国家和政权,又必须有比较强烈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倾向。因而,如何把这两个历史与现实的运动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的战略主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薄一波对此解释道:“这就是说,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使新民主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一俟条件基本成熟,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①当时估计这个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